

对中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几点思考

THOUGHT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WESTERN CHINA

周宜兴

编者按：在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发展战略和格局，一直是各方有识之士忧虑、关注的一大问题。东、中、西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严重失衡，固然有其渊远的历史因缘，但面对这份悲剧性的遗产，我们当代人是简单地承受、默认，还是用现代的科学求实眼光，以时不待我的奋进态度去深究中、西部在中国现代化大潮中重新崛起的一切契机和潜势，力转成局，是至关重要的。无可否认，在面对西部发展的种种难局时，人们往往有某种无可奈何、徒叹无力的偏见和情绪。只顾眼前，先顾一头的思潮时时泛起。这实际上是当前盛行的“短期行为”在区域发展战略层次上的一种反映。

然而，西部问题果真是“积重难返”到只好再一次“留待后人虑”了吗？本文作者从科学求实的角度，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文章朴实无华，但分析精辟，论证独到，见地不凡，读后令人豁然。相信识者定会作出会心的反响。本刊欢迎来稿参与讨论。若此文最终能在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进程中，“石破天惊”，引发出西部开发的新战略、新格局，实中国一大幸事。

中国西部从没有产生过一个符合西部实际的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即使是一些有独特见解的设想也较为少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管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妨碍了大的经济协作区的形成；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在中国形成的西部落后、贫穷的概念和西部投资效益低的偏见，导致了在制定国家总体规划时，对西部的忽视态度；三是由于西部自身的自卑感和依赖性。长期受制于中央计划的约束，长期依靠中央拨款过日子的局面，使西部的自我发展意识淡薄，自我发展能力低下，因此对发展战略的研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促进了中国国内经济利益结构的区域化，区域间的利益竞争强化了区域极化的发展。特别是优先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提出之后，中国东部与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的趋势变得更加明显。这一严峻的现实，引起了国内有

识之士，西部省、区的政府官员和经济界人士对西部经济问题的重视，大家都把注意力投向西部经济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方面。一个旨在探求和设计中国西部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热潮开始了。

研究中国西部经济发展问题，必须既承认西部经济落后的现实，又必须充分认识西部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优势和所处的环境劣势。西部的落后人皆知之，而西部的优势却鲜为人知，且往往又被偏见所掩盖，被不公正所扭曲。本文就中国西部经济的发展优势和开发问题提出几点想法，供研究中国

* 把中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理论，并未给出明确的划界。本文所指中国西部，并非行政区划中的西北与西南，而是指中国西部目前尚处于经济贫困状态的甘、宁、青、云、贵诸省、区。四川、陕西从其地理与经济特征看应属中部。西藏与新疆两个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亦不应划归西部经济地带。

西部经济的学者参考。

人口优势：对 10 亿人口的中国来讲，考虑任何经济问题，首要的一条就是要研究人口作为社会发展的惯性，对经济发展的阻滞作用及其大小。在这一点上，西部有着非常优于东部、中部的条件。西部各省区的人口总数是较少的（以甘、宁、青三省区为例，其人口总数约为 3 000 万）。因此，西部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完全可以在启动惯性较小的优势下，获得较大的发展加速度，从而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有可能超过东部、中部的大多数省、区。西部的这一优势往往被人们忽略，尤其是被西部人自己所忽略。当然，人口素质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西部人口素质相对东部、中部要差一些。但是，人口素质是可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兴起而不断提高的，而人口过多的负担，却是永远难以卸脱的制约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

被扭曲了的经济效益：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西部投资效益低的概念，即所谓西部投资的“黑洞效应”之说。这一说法成了经济决策者与经济专家们制定投资规划的一个不成文的依据，一个不利于西部的依据，一个不公正的依据。实际上，西部的投资效益是被不合理的管理体制和价格政策扭曲了。

建国以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国家对西部的投资主要用于发展以铁路、公路为主体的交通运输业，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以军事工业为主体的大三线工业体系。第一到第六个五年计划的 30 年期间，国家在西部的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 26%。这些投资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中国西部工业的基础和生产规模。几十年来，西部工业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少企业的经济效益是相当高的，是名列全国同行之首的。

但是，从总体上看，西部投资的综合经济效益确实很低。究其原因有二：第一、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妨害了西部经济的综合发展。西部的工业分属于中央各部、委或总公司，它们各事其主，很难形成一个协调的整体，更没有与西部的地方经济相结合。墙内是现代化的大工业，墙外是落后、贫穷的农业和牧业。这种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在中国的西部表现得尤为明显，矛盾也较尖锐。中央各部、委和总公司通过西部工业，把西部的资源吸走，但并未对资源地的西部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应有的帮助和支持。这种带有掠夺性质的开发，使西部经济发展缓慢，地方工业、农业、牧业长期处于

落后状态，综合效益必然低下。西部工业就象荒漠中的几棵孤独的大树，既然没有能在自己的周围造就出植物群落，它自身也就难以根深叶茂。第二，计、统、低的价格政策，使西部大吃暗亏。中国长期实行产品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对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西部极为不利。西部生产的 95% 以上的原材料，被中央各部指令性计划统一以低价调走。比如甘肃的镍，1988 年国际市场价格约为 2 万美元 / 吨，国内市场价格为 7~11 万元 / 吨，而国家从企业调出的计划价格仅为 2.15 万元 / 吨。宁夏的优质太西煤，国际市场的离岸价是 95 美元 / 吨，而国家从煤矿调走的计划价格仅为 30~33 元 / 吨，这种例子还可列举出许多。正是这种价格差所形成的价格漏斗，使西部每年净损失约数十亿元。这种损失在财政收支上是表现不出来的，是从漏斗中暗暗流失掉的。人们所能看到的是，国家从财政上每年给西部每个省补助若干亿元的明帐。这就造成了一个错觉，国家对西部的巨额投资，在西部没有引起经济上的增长，反而象无底洞一样，年复一年地需要中央财政不断地给予补贴。难怪一些没有深入西部作实地调查，而仅凭财政统计数据作分析的经济专家要作出“黑洞效应”的结论来。

这种暗漏明补的经济格局，使西部各省、区长期处于“吃饭财政”的状态，即财政收入仅够维持生计，没有更多的财力去改造国土、改变恶劣的生态环境，并对农业、牧业给以有效的投资。这就是建国几十年来西部仍有大约 1/3 的农、牧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暗漏明补的格局，还造成西部大多数工矿企业的低效益和亏损，大多数企业无力更新改造设备以提高生产能力，地方工业的发展就更为艰辛。建国以来，中国西部的工业、农业与建国前相比确有长足的发展，但其综合经济的发展水平却仍然很低，尤其是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干旱贫困区的人民生活，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准上。“捧着金饭碗要饭”的表象，正是由计、统、低政策的凸凹镜所扭曲而产生的。

在平等条件下进行区域间竞争：中国的改革，促进了区域极化的发展。但是，区域间的竞争却是在极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使西部仍然处于吃亏的地位。本来，在产品经济的旧体制中，西部生产的原材料按计划低价调出，西部所需东部深加工的制成品也是计划低价调入，进与出基本上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价格体系方面实行双轨制，对西部的原材料及能源继续执行产品经济的计划低价政策，而东部进入西部的多种制

成品却按商品经济实行市场价格。这样就使西部蒙受了原材料与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所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这种本来是国际市场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往来中出现的掠夺性质的剪刀差，却在中国国内的区域竞争中出现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东部与西部的差距不是减小，反而是越来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西部不仅在价格方面蒙受损失，而且在产品自主权方面，由于无权支配自己所生产的产品，从而也失去了对紧俏原材料所拥有的市场优势。在双重体制下，东部越是开放搞活，其投资就越多越大，从而促使社会总需求的膨胀；越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矛盾尖锐的时候，国家对西部的原材料就统得越死，西部所吃的亏也就越大。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怪而不怪的现象就是，西部尽其水电、矿产资源和劳力而生产的高耗能有色金属，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低价被统配调出之后，东部某些省却利用这些物资，用其所拥有的外贸权，进行镍、铝、硅、铁等紧俏原材料的炒买炒卖，从而大赚外汇，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双重体制下的西部正是在被捆住手脚的条件下与别人竞争的。所谓西部是“富饶的贫穷”的现象，就是由不平等条件造成的。这种不平等的状况应当尽早改变。为了使西部能在平等条件下参加区域竞争，国家应当从三个方面对西部给予政策方面的强投入，即放开原材料价格，退还西部应当拥有的产品自主权，给予一定的原材料外贸出口权。这样西部就会获得经济上的自发展能力和竞争优势，才能与东部各开放省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协作与竞争，才能具有吸引外资的优势，从而使西部经济发生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过程，不再需要财政补贴，把“黑洞效应”变成“热核反应”，减少乃至消除与东部的差距。这对西部来讲，并非过高的奢想，而是完全可能的现实。

新的机遇：1988年初，当优先发展沿海经济的战略提出之后，西部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基本上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理论，把中国分成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并按此顺序，优先加速发展沿海，重点发展中部，西部作开发准备，这种时序与

空间三阶的发展部署是必然的。因此，国家对沿海在投资上、政策上给予倾斜也是必要的，只有当东部、中部发展起来之后，发达地区的资金才会转向西部。因此，今后一二十年内东部与西部的差距只会进一步拉大，这是中国区域极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此相反的另一观点则认为，区域竞争必须在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给予东部沿海的优惠政策，也应当给予西部，西部更需要政策强投入。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在充分分析了西部在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之后指出：必须研究在优先发展沿海经济的总战略下，应当同时给予西部某种反倾斜政策，使西部经济也不失时机地同步发展起来，而不是等待，也不能等待。

1988年7月在兰州召开的甘、宁、青三省区经济发展研讨会上，产生了一个“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方案，以及目前正在研究制定中的“云贵高原经济开发区”的方案，都是为中国西部经济的同步发展所作的实政研究。这两个方案的实施，将为西部提供良好的开发环境与条件。西部应当以这两个开发区的建设为契机，制定出符合西部实际的宏观发展战略规划，尤其要重视对中国西部国土的整治，要对西部的农业与牧业给予极大的重视和足够的投资，尽早使西部广大农牧民走向富裕。切忌过去只重视大工业的发展，而忽视周围群落同步发展的老路子的重演。这是西部经济区别于东部沿海地区的重要之点，只有把握住这一特点，中国西部经济才会真正发展起来。这里借鉴国际上对矿产资源地区开发的经验与教训是有益于制定中国西部的长远发展规划的。要防止苏联巴库油田在石油资源开采枯竭后，整个资源地一片废墟、满目苍凉的景象在中国西部重演。希望美国加利福尼亚边开发石油，边改良资源地生态环境，同时全面发展资源地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使资源地同步繁荣起来的经验，在中国西部采用。这样随着中国西部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丝绸之路将会显示其现代化的新风采。

本文作者周宜兴（Zhou Yixing）系兰州商学院兼职副教授，中国民主同盟甘肃省委会秘书长。